

國家圖書館藏《剿闖小說》探考 —兼論《剿闖小說》現存最早刊本的問題—

羅景文

摘要

由於學界對於國家圖書館藏興文館刊本《剿闖小說》認識不深，常將此書與日本內閣文庫藏興文館刊本混為一談。有鑑於此，本文先說明此書的來歷，及其入藏臺灣國家圖書館的過程，進而辨別兩種興文館刊本在版式以及內容上的差異，並指出學界之所以混淆這兩個版本的原因。在釐清了兩種興文館刊本的差異之後，本論文將從臺灣國家圖書館藏興文館刊本（以下簡稱臺灣國圖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越然舊藏刊本兩種版本的比較中，論證臺灣國圖本為目前現存最早的刊本。因此，在探討《剿闖小說》的版本問題時，臺灣國圖本的重要性與地位自然不容忽視。最後介紹與臺灣國圖本同版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以增進學界對該書的認識。

關鍵詞 (Keywords)：國家圖書館；剿闖小說；興文館刊本；版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Jiachuangxiaoshuo*；Xingwenguan Printed Copy；Edition

羅景文：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E-mail: jingwen123@pchome.com.tw

一、前 言

在明末清初產生了一批反映當代時事的小說，研究者名之為「時事小說」^[1]，這些時事小說除了成書迅速、多抄史料、結構零散與文采不彰等特徵之外^[2]，其刊刻版次之多亦是一顯著的特色，此肇因於明清之際瞬息萬變的動盪時局，書賈不得不隨著時勢的變化刪改內容。清朝定鼎之後，又以政治力介入文獻圖書的刊刻與流傳，許多有「違礙」內容的小說不得不改名另行出版，以掩人耳目；或是改以抄本流播，在極小的範圍之內流通。而書坊之間又常有翻刻盜印的現象。這些因素使得小說的版本及流傳狀況頗為錯綜複雜，而《剿闖小說》便是這樣的一部時事小說。

《剿闖小說》內容描寫明末闖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自縊，後吳三桂領清兵入關剿闖平亂的一段時事。此書版本的流傳演變頗為複雜，歷來多有學者關注或研究，如：周越然^[3]、郭沫若^[4]、齊如山^[5]、譚正璧^[6]、欒星^[7]、陳大道^[8]、蕭相

[1] 欒星，〈明清之際的三部講史小說——《剿闖通俗小說》《定鼎奇聞》與《樵史通俗演義》〉，《明清小說論叢》第3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6），頁146。此文後收入欒星，《甲申史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頁279-297。另有其他研究者將「時事小說」稱為「事實小說」、「新聞小說」、「今聞小說」，相關名稱之探討詳見：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12），第二章第一節〈時事小說釋義及界說〉，頁6-18。

[2]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載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3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12），頁181-220。

[3] 周越然，〈剿闖小說〉一文（文末所署時間為1935年1月5日），收錄於氏著《書書書》（上海：中華日報社，1944.5），頁98-102。後又收入氏著《書與回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9），頁91-95。

[4] 郭沫若為《李闖小史》所作之〈跋〉，懶道人，《李闖小史》（重慶：說文社，1944.3，封面題《李闖王》），頁135-138。

[5] 齊如山，〈百舍齋所藏通俗小說書錄〉，《圖書季刊》，8：3/4（1947.12），頁16。

[6] 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11），頁256-257。

[7] 欒星，〈明清之際的三部講史小說——《剿闖通俗小說》《定鼎奇聞》與《樵史通俗演義》〉，《明清小說論叢》第3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6），頁147-148。

[8] 陳大道，〈剿闖小說三種不同版本的問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3：1（1990.6），頁143-150。

愷^[9]、顏美娟^[10]、潘建國^[11] 等人，以及各種古典小說書目的著錄^[12] 而根據潘建國先生的研究，《剿闖小說》目前可知的版本至少有 13 種。歷來學者多認為明末興文館刊本為原刊本，但實際上興文館刊本因行款的不同而有兩個系統，一是半葉 8 行，行 22 字系統，另一種是半葉 9 行，行 26 字系統。前者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後者則藏於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然而，美國哈佛燕京本書首序文殘缺較多，因此未能得知其為何處出版，但經由比對可知美國哈佛燕京本與國家圖書館興文館藏本（以下簡稱臺灣國圖本）同版（下文詳述）。相較之下，臺灣國圖本比美國哈佛燕京本完整，而且學者對於臺灣國圖本多所誤解，加上此書入藏國家圖書館之過程頗費周折，因此本文將以臺灣國圖本為論述的主要對象。

這兩種興文館刊本在版式特徵和內容上實有多處差異，但由於部分學者未見原本，加上書目著錄不夠明確，遂將兩者視為同版。這不僅無法釐清相關版本的演變過程，也忽略了臺灣國圖本（即半葉 9 行 26 字系統）在探討《剿闖小說相關》版本演變時的重要性。因此，本文首先介紹臺灣國圖本的來歷與入藏經過；進而辨析兩種興文館刊本的差異，並說明造成學者混淆這兩種刊本的原因，以補充前人看法之不足、澄清前人的誤解；之後，探討何者為《剿闖小說》現存最早的版本，並說明臺灣國圖本在諸版本中的地位；最後，介紹美國哈佛燕京本的版本特色。

[9] 蕭相愷，〈南京圖書館抄本《剿闖通俗小說》〉，收入氏著《珍本禁毀小說大觀——稗海訪書錄》2 版（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7），頁 524-528。

[10]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12），頁 128-135。

[11] 潘建國，〈南明《剿闖小說》版本輯考〉，收入氏著《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5），頁 64-65。

[12] 舉其要者，如：

1.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2），頁 78。
2.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5），頁 248。
3. 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公司，1990.2），頁 296。
4. 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9），頁 158-159。

二、國家圖書館藏興文館刊本的來歷與入藏經過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南京圖書館藏有《剿闖小說》明弘光元年(1645年)刊本，然而此書今不存南京圖書館，而藏於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的前身是國立中央圖書館，1948年國共內戰，江南局勢緊張，中央圖書館奉令將善本運往臺灣，於1954年在臺復館，仍維持原名中央圖書館，後於1996年始易名「國家圖書館」^[13]，為避免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混淆^[14]，以下簡稱「臺灣國圖」。這批運往臺灣典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一部便是原存於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剿闖小說》。

此書與其他善本古籍是由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先生與港滬有識志士，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中英庚款會及教育部的經費支持下，於1940—1941年抗戰期間冒險搜購而得。^[15]在上海方面，主要是由鄭振鐸負責，並撰寫工作報告書，說明搶救工作以及購書情形，一共有九次報告。^[16]其中與《剿闖小

[13] 關於南京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1948年之前的發展情況詳見宮愛東，〈南京圖書館〉，收入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12)，頁180-184。並參見：

1. 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編輯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4)，頁28、30。
2. 盧錦堂，〈國立中央圖書館古籍蒐藏與整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1(1993.4)，頁154。

[14] 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名北京圖書館，1998年易名為國家圖書館，對外稱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國圖。

[15] 詳見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1998：1(1998.6)，頁1-22。

[16] 這九號「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工作報告書檔案，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內部稱之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舊案卷》，檔案內容詳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6：1(1983.4)，頁73-98。關於鄭氏與「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搶救善本古籍的過程與貢獻，參見：

1. 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收入氏著《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9)，頁223-236。
2. 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刊》，1997：1(1997.6)，頁95-115。
3. 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林清芬，〈抗戰前後鄭振鐸的整理國故與刊印古籍工作〉，《國家圖書館刊》，1999：1(1999.6)，頁77-110。

說》有關的資料見諸第三號及第七號報告書，其內容如下：[17]

至零購諸書，亦有極堪注意者……從中國書店得大興傅以禮舊藏明末史料書不少……《馘闖小史》、《剿闖小說》等，多有傅氏校及跋，皆極難得之書也。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作報告書〉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其他零星在滬肆所得，重要者有：……（六）明末刊本《剿闖小說》……（〈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七號工作報告書〉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六日）

第一則訊息提到鄭氏於中國書店購得傅氏舊藏《馘闖小史》、《剿闖小說》兩書，而這兩部書之間有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可由中國國圖現藏傅氏舊藏抄本《剿闖小說》獲得解答，其書書首有傅氏跋語云：[18]

《剿闖小說》五卷、《馘闖小史》六卷，一署「西吳懶道人口授」，一署「潤州葫蘆道人避暑筆」。卷首有「西吳九十翁無競氏」序，均不詳其名氏。其書雖分兩種，而事跡連屬，特出一手。

由此可知，傅氏舊藏兩部抄本雖各自獨立，作者署名亦不同，但兩書內容連貫。不過，這兩部書均未隨著其它善本運往臺灣典藏，其中一部《剿闖小說》藏於中國國圖。其書入藏該館的過程亦值得探究，據周勛初先生〈季振宜唐詩的編纂與流傳〉一文記載，1948年前後，大陸政局急轉直下，南京政府下令中央圖書館分批將所藏精品運往臺灣，其中一批 253 種藏品先運到香港，暫放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並未運往臺灣。中共建國後，英國與之建交，於是這批善本被寄回南京。1959 年，江蘇省文化局將書送到北京等待處理。1961 年，中共文化部決定將其中 154 種撥交北京圖書館，99 種發還南京圖書館。[19] 這部《剿闖小說》可能即由此途徑入藏該館。

可惜的是，另一部《馘闖小史》目前下落不明，或許在屢經搬運移轉的過程中遺失了。所幸，文獻保存同志會在搶救善本古籍的同時，選擇若干孤本攝成照片以備影印，避免古籍在戰亂中轉運遭受不測，一共選印 33 種，裝訂成 120

[17] 引文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史料選輯〉，頁 78、90。經查證〈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作報告書〉原件作《剿闖小說》，而館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史料選輯〉所引誤作《馘闖小史》，今據此改正。感謝審查委員告知，謹此致謝。

[18] 轉引自註 11，頁 62。

[19] 詳見周勳初，《周勳初文集·文史新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9），頁 514。此則訊息感謝審查委員告知，謹此致謝。

冊，命名為《玄覽堂叢書》^[20]，其中一部便是傅氏舊藏抄本《馘闖小史》。有意思的是，鄭氏僅影印《馘闖小史》，卻未影印另一部《剿闖小說》，此有違常理。筆者推測其中緣故，應是鄭氏日後又購得明末刊本《剿闖小說》，此與傅氏舊藏抄本《剿闖小說》重出，兩者內容大致相同，並非僅存的孤本。在經費、人力有限，加上局勢緊張的狀況下，鄭氏只好先影印《馘闖小史》了。

第二則訊息提到鄭氏於上海書肆購得明末刊本《剿闖小說》，從相關訊息來看，此書曾流轉多方。書首有芑翁手書二則題跋：

此弘光元年秋間書，曾被燬禁，孤本備載其時民間傳說，中多佚聞，足資考證，非常可貴，丙子春以重值得於西溪汪氏。 芑翁記。

頃於近人所編雜誌中見傅惜華〈《樵史演義》之發見〉一文，徵及此書，云僅日本內閣文庫藏之，國中未見。《樵史演義》亦清初明遺老作，記明末事者，今藏北大圖書館。 丙子冬芑翁又記。

從芑翁手書題跋可知，此書原為安徽歙縣西溪汪氏家族所藏，西溪汪氏素以藏書豐富著稱。^[21]而第二則題跋提及傅氏〈《樵史演義》之發見〉一文，此文發表於《逸經》第20期^[22]，故題跋未記時間「丙子」即為1936年。這兩則題跋不僅說明此書來歷，也述及成書時間^[23]和文獻、版本價值。然不知何故，此書又從芑翁手中流落至上海書肆，後為鄭振鐸所購得。

[20] 詳見蔣復璁，〈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4：1（1981.6），頁56-57。蔣氏於文中提到《玄覽堂叢書》「首冠玄覽居士序一篇，即係徐森玉先生主筆」，此處有誤，玄覽居士即鄭振鐸，詳見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頁111-112。

[21] 詳見姚邦藻主編，《徽州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頁397。

[22] 傅惜華，〈《樵史演義》之發見〉，《逸經》，20（1936.12.20），頁27-29。

[23] 芑翁認為《剿闖小說》於明弘光元年秋間成書。對此，顏美娟提出不同的看法，顏氏從《剿闖小說》序文，以及書中左良玉舉兵武昌事來推斷，「是年秋天（崇禎十七年），此書的初稿已完成，……最遲在次年（弘光元年）三月……第一版已刊出」，詳見氏著「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頁127。顏氏所云無誤，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日「壬寅，監國福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弘光，以明年為元年」；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都陷，（弘光）被執」；同年閏六月廿七日「監國唐王即皇帝位於南郊……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上述引文見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頁4、105、13。由此可知，弘光於崇禎十七年五月即皇帝位時，並未以是年為弘光元年（1644），而以隔年為弘光元年（1645），然弘光元年又僅止於六月，未及於秋季。因此，《剿闖小說》不可能成書於「弘光元年秋間」，這顯然是芑翁誤將弘光即位當年視為弘光元年，才有這樣的推論。

《剿闖小說》與其它善本珍籍多度藏於外商銀行中^[24]，1941 年之後上海局勢趨於危急，恐危及到善本，故鄭氏等人先將部分較精善古籍郵寄至香港，日後再從香港轉運重慶或是美國。其中最精品的 80 種，則由徐森玉隨身攜出，於 9 月 10 日抵達重慶中央圖書館。而郵寄至香港的古籍約 2,390 部，約 2 萬 3 千冊，暫時寄存於馮平山圖書館，由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與馬鑑（季明）派人協助保管。眾人在等待將善本轉運重慶或美國的消息時，便先將上海寄來的古籍裝箱整理。^[25] 同年 10 月，教育部與中央圖書館最後雖然決定將這些古籍運往美國，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但仍指示負責此事務的葉恭綽將部分古籍寄往重慶。這兩批欲運往美國、重慶的善本均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而被迫停頓。未能運往美國的善本，仍存於馮平山圖書館，後為日軍波部隊強行運往日本，迨抗戰勝利後，始運返南京中央圖書館。^[26]

至於原欲寄往重慶之善本，後來下落如何，亦值得關切。1946 年 4 月 16 日抄錄，後經校補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在香港遺失之善本圖書目錄〉中，有「擬由港寄渝未曾寄出之圖書」一節提到：^[27]

曩年由葉玉甫先生在港選出圖書若干種，擬郵寄重慶，但未及寄出，香港遽淪陷，此一批書已由簡又文先生在香港東亞銀行倉庫中發現，並經清點後，有目錄報部。茲以簡又文先生報部之目，與葉玉甫當年由港寄渝之目相校，則尚有兩種未被發現，其書如下列：

[24] 據沈津先生所言，當時善本圖書「除法寶館外，尚有部分存於鄭振鐸家及南京路，總共三處」，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頁 103。但根據相關史料，上海志士所搶救的這批古籍多存於上海某外商銀行中而非法寶館，如〈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書〉提到：「前電所借法寶館，僅得二樓一間之半，以書櫥隔之，無門無鎖，且與僧人雜居，甚不謹慎，不宜儲藏，只可作為抄寫書目之辦事處」。又如〈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所云：「現正陸續編目裝箱，裝箱時分為三種：一為甲類善本；一為乙類善本。其他為普通本（即丙類）。甲類善本，裝旅行大箱存放外商銀行。乙、丙二類，裝大木箱，存放外商銀行堆棧。」從這些史料來看，法寶館並非主要度藏善本珍籍之處，上述報告書引文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史料選輯〉，頁 74、76。

[25] 1. 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9），頁 233。

2. 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2（2003.10），頁 130-131。

[26] 關於日人劫走原欲運往美國之善本書的過程，詳見同註 25 之 1，頁 234-235；同註 25 之 2，頁 132-134。

[27] 引文轉引自同註 25 之 2，頁 138-139。

《李氏焚餘》五冊 《剿闖小說》一冊

(校：此二種已由葉玉甫先生交來。)[28]

這份資料不僅說明了這批善本的下落，也明確列出《剿闖小說》一書，提供不少值得注意的訊息：我們可以知悉此書原是由滬寄港較為精善的版本之一，在港等待日後的轉運或郵寄，後來相關人員決定將此書和其它善本先寄往重慶，而非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之後也就未被日人劫走。不過，此書為何未與其它寄渝的善本一同存於香港東亞銀行，卻另由葉氏交回中央圖書館，這其中頗有原委。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有 1946 年 5 月 13 日〈葉恭綽致蔣復璁函〉，葉氏云：[29]

前此執事開單，擬提出寄渝之書（三十年十一月底事），當時經馬季明先生檢出，由弟包封，擬交空郵，後以航空公司可以帶渝，遂改託其帶寄。不料延未運出，且放置該公司過道，弟恐其弄壞，遂先取存陸佑行英庚會辦事處，候有一定運期，再交與該公司，不料數日間戰事遂起。逮香港淪陷，弟覓人冒險往探，則已並其他文件一併失去。旋探知為人移存他處，經給賞，取回弟九龍寓內。嗣歷數月，有人入內地，因託其密運，至廣九灣，從此遂無消息，弟以為失去矣。勝利後，經手人來，云該件因廣州灣受阻，遂仍運回港，幸未失去，仍存東亞銀行。弟因告知杭立武先生設法取出，其中又經許多周折，始由簡又文手取。

葉氏在郵寄這些善本時可謂大費周章、風波迭生，最後仍未能將書郵寄至渝。從這段記錄我們可以推測，《剿闖小說》是在這些運送的過程中為人攜出或是遺漏了，未與其它善本整批寄存於東亞銀行，事後也就未與其它善本同時回歸中央圖書館，而由葉氏另外交回。令人好奇的是，葉氏是如何找回這二部書？[30]目前資料不足，尚無法釐清。不過，從這一條線索，我們可以得知《剿闖小說》曾由葉氏保管一段時間。

有別於其他封箱寄運美國、重慶的善本古籍，《剿闖小說》寄存在港期間，便有學者加以抄錄流傳。今南京圖書館藏有紅格抄本《剿闖通俗小說》即根據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剿闖小說》抄錄，卷首有柳亞子以及芑翁的題跋三篇，其中芑

[28] 補校的時間是 1946 年 11 月 27 日。

[29] 轉引自同註 27，頁 139。

[30] 此看法承蒙審查委員告知，謹此致謝。

翁題跋已如前文所述，而柳亞子手書題跋云：^[31]

余曩輯《南明紀年史綱》八卷、《南明后妃、儲貳、諸王宗室列傳》若干卷及所藏南明史料數百種，盡毀於香港之變，翌歲間內渡，入夏始抵桂林。已而，季明先生亦自港脫險來此，攜寫本《剿闖通俗小說》兩冊見示，蓋南明朝刊版，而先生索難島上時得之，且為手錄焉，嗚呼！江陵一炬，文武道盡，而蒙泉碩果之餘，轉輾掇拾傳出於一代耆儒之手者，文字因緣，烏能無所感激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三日吳江柳亞子記。

柳亞子是研究南明史的專家，對於南明史料收藏甚勤，然香港淪陷，慌亂之際未能攜出藏書，這使得柳氏萬念俱灰、扼腕不已。因此，當柳氏遇到同為入桂避難的馬鑑出示手抄本《剿闖通俗小說》時，便頗有感觸，語氣中便充滿著遭逢國難家變的感慨。而馬鑑又如何能抄錄原欲郵寄重慶的《剿闖小說》呢？馬氏能接近或抄錄《剿闖小說》的時間點有三：一是善本寄存於香港馮平山圖書館時，此時即由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與馬鑑協助保管；二是在馬氏協助葉氏檢點善本，以便郵寄重慶時；三則是在葉氏找回《剿闖小說》時。不過，前兩者可能性較低，馬氏雖協助保管善本，並不能隨意開箱翻閱；而檢點善本則是爭取時間、講求時效，目的在於盡速將善本郵寄重慶，馬氏並無餘裕可以抄錄善本。因此，馬氏抄錄小說最有可能的時間點，便是上述葉氏找回《剿闖小說》之後，馬氏抵桂避難之前，即 1942 年上半年間。

以上討論了《剿闖小說》的來歷，以及搶救和入藏中央圖書館的過程，足見其經手多人、流轉多方的坎坷命運，此亦可窺知文獻保存同志會以及淪滬港三地志士搶救善本的堅苦卓絕，以及為保存國家文化所付出的心力，這也說明了《剿闖小說》的文獻、版本價值。以下將釐清學界對兩種興文館刊本的誤解，同時說明造成學者誤解的原因。

三、學界對兩種興文館刊本的誤解及其原因

臺灣國圖與日本內閣文庫藏《剿闖小說》之所以被稱為「興文館刊本」，是因

[31] 轉引自註 9，頁 524。蕭氏於文中提到此書卷首有「董翁『記』」二篇題跋，其署名亦為「董翁」，然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剿闖小說》卷首題記署名「芑翁」，而非「董翁」，不知是馬氏抄錄有誤，抑或是蕭氏誤植。

爲兩書序文均提到其刊刻緣由：^[32]

余（筆者按：即作序者西吳九十翁無競氏）結夏半月泉精舍，遇懶道人從吳下來，口述此事甚詳，因及西平勦賊一事，娓娓可聽，大快人意。命童子援筆錄之，可怒可喜，具在此編中。用以激發忠義，懲創叛逆，其於天理人心，大有關係，非泛嘗因果平話比。故興文館請以付梓，而余爲敘數行于首。

《剿闖小說》是由興文館付梓出版的，因此學者多稱其爲「興文館刊本」。這兩種版本雷同之處甚多，但其差異之處亦明顯可見，爲清楚說明兩者的差異，筆者整理成兩表，如下所示：

表一：書題之差異

書題位置 版本	書名葉	序文	目錄	插圖 版心	正文卷端	版心	書末
臺灣國圖本	勦闖小說	殘	勦闖通俗小說	各回目回	勦闖小說	忠孝傳	無
日本內閣 文庫本	無	勦闖小說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	繡像勦闖小說	新編勦闖小說 (第1回)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 (第6回)	勦闖小說	新編勦闖小說

表二：撰序者、作者題署，以及正文版式之差異

內容 版本	撰序者題署	正文作者題署	正文版式
臺灣國圖本	西吳九十翁無競氏題	西吳懶道人口授	半葉9行，行26字，楷體寫刻（軟體字）。白口、單邊。正文低一格，遇朝廷事頂格。有圈點旁勒。
日本內閣 文庫本	西吳九十翁無競氏題於雲溪之半月泉	西吳懶道人口授（第一回） 西吳懶道人口授（第六回）	半葉8行，行22字，宋體（硬體字）。白口、單邊。正文低一格，遇朝廷事頂格。有圈點旁勒。

從以上兩表的對照中，不難發現這兩種興文館刊本在目錄、正文卷端、版心、行款，以及字體等特徵上有所不同。不僅如此，兩者在內容上亦有詳略差

[32] 臺灣國圖藏《勦闖小說》，見敘第5、6葉；日本內閣文庫藏《勦闖小說》，則有《古本小說集成》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9-12。

異，如第二回，臺灣國圖本有〈京邸抄出崇禎皇帝三月初八日聖諭〉^[33]，而日本內閣文庫本則刪去，改為「五月十六日恭聞退詔，痛皇上果罹奇變，又時事紛紜，謹擬代當代名公揮淚移文，再告天下」，並增加〈痛哭詩〉二首、〈重記閒越郡三忠死難實錄〉、〈草莽孤臣弔越郡三忠賦〉、〈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重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弔四忠詩〉等內容^[34]；又如第六回，內閣文庫本將原置於臺灣國圖本全書末的〈頌平西伯吳三桂號念之奏捷新封薊國公〉、〈代凱歌贊吳平西調水調歌頭〉^[35]改置於第六回，並增加〈姚少師碑〉、〈宮娥出禁詞〉、〈美女嘆〉等內容^[36]，此皆臺灣國圖本所無；再如第八回，臺灣國圖本有〈左良玉上弘光疏〉^[37]，議論國事，而日本內閣文庫本則改為〈龔雲起上錢牧齋書〉。^[38] 諸如此類改易或是增刪的例子不勝枚舉。^[39]

無論是從版式特徵或是內容上的比對，我們都可以發現兩種興文館刊本的確是不同的版本，兩者有顯著的差異。那麼，為何有不少研究者誤將兩種興文館刊本視為同版？尋繹相關研究以及小說書目、善本書目的著錄，學者們的誤解大都起因於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以下簡稱《孫目》）和《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二書。《孫目》著錄此書云：^[40]

存 明弘光元年刊本。【南京圖書館】 明刊本。插圖五葉。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二字。【日本內閣文庫】 明寫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板心題「忠孝傳」。有圈點旁勒，附圖頗精。

明無名氏撰。題「西吳懶道口授」。記李自成起義事始末。至宏（弘）光即位南京而止。

[33] 臺灣國圖藏《剿闖小說》，第二回第 7-9 葉。

[34] 日本內閣文庫藏《剿闖小說》，頁 51-52、56-76。

[35] 臺灣國圖藏《剿闖小說》，第十回第 14 葉 B 面。

[36] 日本內閣文庫藏《剿闖小說》，頁 206-207。

[37] 臺灣國圖藏《剿闖小說》，第八回第 7-10 葉。

[38] 日本內閣文庫藏《剿闖小說》，頁 277-290。

[39] 關於《剿闖小說》各個版本在內容上的差異可參見註 8，頁 145-146。不過，陳文提到日本內閣文庫本第八回回目為「肇中興南都正位 感時事俠客上書」，與臺灣國圖本有異，但實際上兩者無論是在目錄回目，或是正文回日上均同，內閣文庫本第八回回目亦為「肇中興南都正位 感時事草莽上書」，陳文此處有誤。陳文又云《剿闖小史》（即重慶說文社排印山東圖書館藏清鈔本，並將其改稱為《李闖小史》或《李闖王》）第六回較臺灣國圖本多〈姚少師碑〉、〈宮娥出禁詞〉、〈美女嘆〉二首，此處亦誤。《剿闖小史》將其置於全書之末「附錄」，而非置於第六回，詳見懶道人，《李闖小史》（重慶：說文社，1944.3），頁 127-133。

[40]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78。

《孫目》此處著錄頗為含糊，三種版本均未標明刊刻書坊，亦未說明南京圖書館藏明弘光元年刊本的行款版式特徵，以及另一明寫刻本的藏處。而孫氏《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則標明日本內閣文庫本為「明興文館刊本」^[41]，因此研究者多將內閣文庫本稱為「興文館刊本」。又加上，孫氏提到小說內容止於「弘光」即位南京，然歷史上僅有弘光元年。因此，研究者便將日本內閣文庫本視為弘光元年刊本^[42]，如欒星及廖可斌兩位先生便是受此影響，認為內閣文庫藏興文館刊本亦是「弘光元年刊本」。^[43]但由於孫氏未註明南京圖書館藏本的行款版式，研究者不易分辨兩者之間的差異，如此一來遂將日本內閣文庫本等同於南京圖書館藏弘光元年刊本。這種看法也影響日後學者對《剿闖小說》版本的判定。

由於臺灣國圖與南京圖書館的前身，均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因此學者多認為原南京圖書館藏《剿闖小說》即為目前臺灣國圖本^[44]，實際情況正是如此，學界的看法無誤。而臺灣國圖編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增訂版等書，兩者均著錄《剿闖小說》，初稿云：「《剿闖小說》十回一冊 明西吳懶道口授 無競氏筆錄 明弘光元年刊本 附圖三葉」^[45]，而增訂版所著錄的內容與前者完全相

[41]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5），頁 62。

[42] 如註 22 所述，弘光於南京即皇帝位時，為甲申（1644），而非弘光元年。至隔年才為弘光元年（1645），兩者實有不同，但易為研究者忽略。

[43] 如欒星云，「明弘光元年乙酉（順治二年）興文館刊本。題《新編剿闖通俗小說》。圖五頁，十面。正文半頁八行，行二十二字。日本內閣文庫藏。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著錄。另孫氏《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前南京圖書館所藏『明弘光元年刻本』者，亦當為此本。」見氏著《明清之際的三部講史小說——《剿闖通俗小說》《定鼎奇聞》與《樵史通俗演義》，頁 147；又如廖可斌云：「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此書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孫目定其刊於弘光元年（1645）。」見廖氏為《剿闖小說》所撰之序，《古本小說集成》，頁 2。實際上，孫氏並未判定內閣文庫藏本刊於弘光元年，但因為其著錄的模糊，使研究者容易混淆其間的差異。

[44] 如欒星云：「今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載有此書，當與孫目著錄者為一本」，同上註；又如潘建國云：「《孫目》（1957 年版）曾著錄南京圖書館亦藏有興文館本，今已不存；而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子部·小說家類』著錄《剿闖小說》十回一冊，……，當即興文館本。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原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古籍多捆載臺灣，則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興文館本，或為南京圖書館舊藏。」見註 11，頁 61。

[45]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上冊（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8），「甲編卷三·子部小說類」，頁 159。而屈萬里先生所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則略去「附圖三葉」，而改以「近人菴翁題記」，見屈萬里，《屈萬里先生全集》第 16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2），頁 179。

同。^[46] 這兩份書目僅著錄此書的作者、版本概況，卻未註明此書的行款，研究者也就無從分辨兩種版本的不同，因此《孫目》著錄的模糊所造成的誤解並未能於此釐清。不過，在臺灣國圖特藏組新編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一書中已詳細註明此書行款版式^[47]，這將有助了解臺灣國圖藏《剿闖小說》的原貌，避免與日本內閣文庫本混淆。

以上釐清了臺灣國圖藏《剿闖小說》與日本內閣文庫本在版式、行款，以及內容上的差異，並說明造成學界誤解的原因，乃在於各種書目著錄版本特徵時的模糊和缺漏。由此可知，準確而詳盡地著錄、說明每部善本古籍的圖書形式及內容特徵，這不僅能如實地反映了圖書面貌，也可避免研究者在判別版本時發生混淆。下文將探討《剿闖小說》現存的最早刊本的版本問題，以及臺灣國圖本在諸版本中的地位。

四、《剿闖小說》現存的最早刊本

關於《剿闖小說》的版本概況，歷來的看法多以為興文館刊本為原刊本，而此「興文館刊本」即為日本內閣文庫本。^[48] 但如前文所述，興文館刊本另有臺灣國圖本。由於部分學者未見原本，加上相關書目著錄模糊，因此，研究者遂將臺灣國圖本與內閣文庫本視為同版，這不僅忽略了臺灣國圖本在探討《剿闖小說》版本演變時的重要性，同時對於版本的考察也產生謬誤。

幸運的是，臺灣的學者因地利之便，可前往國家圖書館調閱善本或微縮膠卷，研究兩種興文館刊本在版式和內容上的差異，故能得出較前人不同的成果。根據陳大道與顏美娟兩位學者的研究，他們認為《剿闖小說》刊刻的先後是臺灣國圖本早於日本內閣文庫本，而兩者又早於周越然藏南明刻本，版本的發展是由簡至繁。^[49] 然而，潘建國先生〈南明《剿闖小說》版本輯考〉一文則認為興文館刊本並非原刊本，周越然藏南明刻本（以下簡稱周藏本）是目前最接近原刊本面貌

[46]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 2 版（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12），頁 678。

[47] 詳見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小說家類·演義（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6），頁 139。

[48] 1. 同註 7。

2. 同註 9，頁 525。

[49] 詳見同註 8，頁 143-150；同註 10，頁 132-134。

的版本。其理由為興文館刊本刪去「待清居士」評贊，以及行間夾批，卻在第三及第十回留有評贊，並在第六回留有行間夾批，留下未刪盡的底本痕跡。而且第一回和第六回題署不同，這反而證明興文館刊本是後出的刊本。^[50] 其說甚有說服力，推翻了前述二位學者認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早於周藏本的看法。不過，潘氏亦將兩種興文館刊本視為同版，其所運用的版本即為日本內閣文庫本，而非臺灣國圖本。但經過筆者的比對，臺灣國圖本並無上述刪削未盡，或是題署不同的特徵（詳見附圖一、圖二、圖三）。因此，潘氏的研究只能確定周藏本早於日本內閣文庫本，至於周藏本與臺灣國圖本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比對、確認。換句話說，前輩學者的看法都有重新探討與釐清的必要，方能確定《剿闖小說》各個版本之間的演變順序。

先從臺灣國圖本的版式特徵來看，大致可從以下幾個部分說明：第一，就字體特徵來看，此書通體寫刻，刻工細膩精緻，字體娟秀而端莊，不同於周藏本和日本內閣文庫本以硬體字刊刻。而此書正文前後字跡一致，當是同一人所書。第二，就行款、版面來看，此書行款為半葉 9 行，行 26 字。單行字數雖多，但因為字幅較小，字距較大，加上字體排列整齊，因此整體版面顯得工整疏朗。此不同於周藏本和日本內閣文庫本，後兩者單行字數雖然較少（同為 22 字），然因字距擠密，整體版面也就顯得較為狹窄局促。第三，就書中插圖來看，此書現存三葉六幅，刻工細緻，人物面目清晰可見，此亦較日本內閣文庫本優美精緻（見附圖四）。潘先生云周藏本插圖精美^[51]，筆者雖未見之，但從臺灣國圖本的字體、行款版式與插圖來看，足見書賈經營整體視覺效果的用心，較之周藏本應不遑多讓。

不過，顏美娟先生卻提到此書刊刻多有草率之處：^[52]

央圖本在章回中有明顯的重複及錯置之處，其他版本則無：央圖本在第十五回（筆者按：此處有誤）重複印製了一頁兩面；在第六回第九頁……。此外，序文中亦有數行文字錯置。以上幾處重複及錯置現象可以證明央圖本係首版刊行，未經詳細校勘即倉促付梓。而後來的兩版，經過重新排版，這些編排上的錯誤即未再重現。

[50] 詳見註 11，頁 64-65。而周藏本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51] 同註 50，頁 60。

[52] 同註 10，頁 132。

顏氏從此書刊刻草率來論證此書為首刊本、原刊本，但令人感到矛盾、疑惑的是：此書既然刊刻精美，又怎麼會犯下如此草率粗略的錯誤？後來，筆者前往國圖調閱原本，並與微縮膠卷逐葉比對，發現微卷有多處重攝的現象，如第四回第十葉 B 面與第五回第一葉 A 面、第六回第八葉 B 面與第六回第九葉 A 面（此即顏氏所舉之例）、第十回第十四葉 B 面。以上重複葉均非刊本所有，而是微卷重複製作所造成的誤解。原刊本僅在序文顛倒兩行字句，其次序應為「以激發忠義，懲創叛逆 / 其於天理人心，大有關」，卻錯置為「其於天理人心，大有關 / 以激發忠義，懲創叛逆」。^[53]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此書僅序文字句錯置，而非如顏氏所云刊刻草率之作，因此我們並不能從其刊刻是否草率來論證其為原刊本，必須結合其它方面綜合探討。

再從內容上的增刪改易來看，臺灣國圖本與周藏本相異之處頗多，如周藏本第六回多〈宮娥出禁詞〉，此為臺灣國圖本所無，周藏本並將原置於臺灣國圖本第十回末的〈頌平西伯吳三桂號念之奏捷新封薊國公〉、〈代凱歌贊吳平西調水調歌頭〉改置於第六回；又如周藏本第七回多〈金壇合邑諸生公討降賊諸臣檄〉，此亦為臺灣國圖本所無；再如臺灣國圖本第八回為〈左良玉上弘光帝疏〉，而周藏本則為〈龔雲起上錢牧齋書〉；又如周藏本第九回多〈錢謙益回書〉，此為臺灣國圖本所無；再如周藏本第十回多〈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此亦為臺灣國圖本所無。^[54] 其中，可以作為判斷兩種版本出版先後的關鍵是左良玉的上疏，以及周藏本一再出現，卻為臺灣國圖本所無的「龔雲起」。

史載左良玉與馬士英、阮大鍼本有嫌隙，後來因左氏不滿馬士英裁減他的軍餉，故於弘光元年乙酉三月以「清君側」為名起兵，沿長江東下。^[55] 正因左良玉起兵謀反，所以陳大道與顏美娟兩位學者認為臺灣國圖本較早出版，才能保留〈左良玉上弘光帝疏〉，至於周藏本及日本內閣文庫本均因左良玉事起，作者「為因應時局的變化，不得不撤換第八回左良玉的一段上疏，改補一段杜撰的『上錢牧齋書』」。^[56] 作者因應時勢的變化而改易內容，正顯示出時事小說迅速反映時事的特色。這多少也與避免觸犯禁忌有關，為免不敬君上，作者刪去左良玉的上疏

[53] 見其〈敘〉第六葉 A 面。

[54] 筆者未見周藏本，故相關資料多轉引自周越然，〈剿闖小說〉，《書書書》，頁 100，以及同註 11，頁 68。

[55] 詳見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3），頁 341。

[56] 引文自同註 10，頁 127，並參見同註 8，頁 146。

是可以理解的。

而龔雲起的身份，及其與《剿闖小說》的關係，郭沫若曾於《李闖小史·跋》中考證云：^[57]

懶道人爲誰，恐不易考，而所謂葫蘆道人者蓋即第八卷「感時事俠客上書」中之「毘陵匡社友人龔姓諱雲起字仲震」其人。毘陵今之武進，古屬潤州。第四卷末按語中又作「延陵龔仲震」，附錄其哭降文。第二卷末附「五月十六日恭聞哀詔代當代名公揮淚移文」，末署龔雲起。則所謂無競氏，葫蘆道人，乃至第九卷首之五洲道士，殆均此龔姓者所化名耳。此人乃秀才未第，牢騷滿腹，而迂狂之氣，頗躍躍於紙上。

郭氏從作者與龔雲起的籍貫地望推斷，他認爲無競氏、葫蘆道人均爲龔雲起之化名，不過，這個說法有深入探討與商榷的必要。首先，臺灣國圖本作者題署爲「西吳懶道口授」、「無競氏筆錄」，而書中人物並未出現「龔雲起」，加上「西吳」^[58]並非「毘陵」^[59]，一爲今日浙江湖州，一爲今日江蘇常州，兩者不相混淆。因此，並不能將龔雲起與西吳懶道人或無競氏連上關係，龔雲起應與臺灣國圖本這個版本的成書無關。

其次，就目前的資料來看，最早出現「龔雲起」的版本是周藏本^[60]，恰巧此書序文末署「毘陵學士」，而且第六回作者及評者題署爲「潤州葫蘆道人避暑筆、龍城待清居士漫次評」。龔雲起的地望爲「毘陵」，正好與撰序者的籍貫相同，同時與「潤州」^[61]、「龍城」^[62]有密切的關係，以上這三個地名均爲今日江蘇

[57] 同註 4，頁 136。

[58] 據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5）云：「西吳，明周祁《名義考》以湖州府爲西吳，相當今浙江湖州市及其周圍長興、安吉、德清等縣地」，見頁 357。

[59]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云：「毘陵縣，西漢置，治所即今江蘇常州市。王莽改名毘壇縣。東漢復爲毘陵縣。西晉永嘉五年改名晉陵縣」。同註 58，頁 805。

[60] 周藏本與內閣文庫本均有署名龔雲起，或是與龔氏相關的內容。但因潘氏已論證周藏本早於內閣文庫本，故筆者云目前最早出現「龔雲起」的版本爲周藏本。

[61]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云：「潤州，隋開皇十五年置，治所在延陵縣（今江蘇鎮江市）。大業三年州廢。唐武德三年復置，治所在丹徒縣（今江蘇鎮江市），天寶元年改爲丹陽郡，乾元元年復名潤州。北宋政和三年改爲鎮江府」，見頁 964。

[62] 潘建國，〈南明《剿闖小說》版本輯考〉一文提到：「審其作者評者及撰敘者的籍貫，分署『潤州』、『龍城』及『毘陵』，皆常州（今屬江蘇省）之別稱」，見頁 60-61。

省常州地區的舊稱別名。^[63]由於這四個人籍貫相同，不禁令人懷疑作者、評者、撰序者，以及龔雲起是否為同一人？而值得注意的是，周藏本較臺灣國圖本在議論史事和引用史料的份量上明顯增多，而這些增多的部分又多署名「龔雲起」，或是與龔氏有關。顯然能大量增刪改動內容的作者－葫蘆道人，與「龔雲起」關係甚密，甚至即是「龔雲起」本人，如此才能一再地將自己的看法或議論寫入小說之中，如此說來這些不同的化名只是他在故弄玄虛罷了。

那麼，由龔氏所創作的周藏本與臺灣國圖本孰先孰後呢？我們可以從「葫蘆道人」與「懶道人」的關係來看，潘建國先生認為這兩個名號關係密切，但由於他先得出周藏本早於日本內閣文庫本的結果，所以他認為是翻刻者頗有用心的將「潤州葫蘆道人」改為「西吳懶道人」。^[64]然而，臺灣國圖本並非如日本內閣文庫本有翻刻自它本的現象，因此我們必須就兩種可能發生的情形來推論。若先依循潘先生論點的脈絡，是翻刻者將周藏本「潤州葫蘆道人」改為臺灣國圖本「西吳懶道人」的話，那麼就要刪去小說中許多的個人議論（尤其是與龔雲起有關的部分）、上書奏表，並抽換序跋、改署作者名號、刪去評者評語，同時還要保持全書的風格一致。這些工續煞費周章，而且刪削前書加以改頭換面竟能做到未留痕跡、天衣無縫的地步，即使是善於翻刻刊印的老手亦未必能如此，這顯然不是一般書坊所能達到的境界。換言之，臺灣國圖本翻刻自周藏本的可能性並不高。

換個角度來思考，那是不是翻刻者頗有用心地將「西吳懶道人」改為「潤州葫蘆道人」呢？明末文人龔雲起對於明末政局的動盪不安早有滿腹牢騷，欲要抒發卻不得宣洩。正好此時他見到書坊刊印時事小說，發現其中仍有不少可以補充史料、史事的空間，亦可藉此表達對於政局時勢的看法。作者、評者、撰序者，以及書中人物龔雲起的名號雖然不同，但籍貫同為「毘陵」，而且「懶道人」與「葫蘆道人」有著密切關係^[65]，這種賣弄名號以示博學的技倆，本為文人所擅長。這也就是說，龔氏將原具有商業氣息的作品添枝加葉，而史料的豐富與議論

[63] 據李漢杰主編，《中國分省市縣大辭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0.12）云：「常州市，周稱延陵邑，秦置延陵縣，漢為毘陵縣，晉設晉陵縣，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置常州。1912年置武進縣，1949年設立常州市」，見頁378。

[64] 同註11，頁67。

[65] 潘先生考證兩者關係云：「明馮夢龍曾據宋完話本《西山一窟鬼》，改編成《一窟鬼懶道人除鬼》，收為《警世通言》第十四卷，敘懶道人以葫蘆為法器捉鬼之事……翻刻者顯然熟知上述小說情節，頗有用心地將『潤州葫蘆道人』改為『西吳懶道人』，既相區別，又暗示了某種聯繫的存在」，同上註。

的加強，正突顯出濃厚的文人創作意識。這種文人撰作意識亦可從該書序文中窺見一斑：^[66]

今葫蘆道人，爲篤行潛修之士。以盧扁醫和之技，直探岐黃靈素之典。銓其精蘊，羽翼經史。效春秋而存天理，以遏人欲。攘夷狄以辨人禽，呼醒人心。如針石關通，起死回生，俾正氣生而血復流注。不惟良醫，兼之良相，眞素王能有素臣矣。今新天子定鼎金陵，修明國策，則職史之官，又以是編文獻徵矣，豈止於衍義小史之流哉？不佞待罪詞垣，未盡臣義，乃欲贊以游夏之辭，毋乃自忘其醜乎？雖然，詩云：「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好見，亦不見醜。」謹書之簡端以就正。甲申中秋前三日崑陵學士題。

崑陵學士極力褒揚葫蘆道人的德行修養，以及創作小說的深層意蘊，但若了解崑陵學士與葫蘆道人同爲龔雲起，我們便不難理解這樣的行爲了。龔雲起欲透過小說敘事的建構承載道德意涵，如同《春秋》一般，使小說不僅是「呼醒人心」的鍼砭，更是治國的良方。換句話說，他期許（或認爲）自己不僅是能醫人的良醫，更是能治國的良相。他同時提醒讀者，切莫忽略作者的用心，也不能將這部小說視爲一般的演義野史，以小道視之。他清楚地將作品定位爲「羽翼經史」的著作，經由他巧妙地將小說與經史並置詮解，使得原本屬於俗文學範疇的小說超越既有的邊緣地位，更提升其存在價值與社會功能。這種極爲鮮明且自覺的創作意識，正與龔氏在小說中苦口婆心、大聲疾呼的形象不謀而合，而這也是周藏本與臺灣國圖本最大的不同。

此外，學者尚從其他方面證明臺灣國圖本早於周藏本，如臺灣國圖書名未冠「新編」二字，而周藏本有，故可證明國圖本早於周藏本^[67]；又如臺灣國圖本第十回末無附錄〈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而周藏本有。^[68]不過，這些證據頗爲薄弱。書名上有「新編」或「新鐫」的字樣，未必就與刊刻先後有關^[69]，這也可能是書賈坊肆的出版、行銷策略之一，因此在未了解書籍的出版

[66] 轉引自周越然，〈剿闖小說〉，《書書書》，頁 102。

[67] 詳見同註 10，頁 132。

[68] 詳見同註 8，頁 144；同註 10，頁 245-247。

[69] 關於書名之前的冠詞飾詞，蕭相愷先生曾云：「古小說常常有題『新刻』、『新鐫』，這並不意味著凡標上這類字樣的小說便一定有舊刻本存在。許許多多的初刻本，也都標上『新刻』，或是『新鐫』字樣，『新』者，『新近』也。只有標了『重編』、『重訂』、『新增』、『增訂』之類字樣的本子，才可推定它可能有舊本存在。」見氏著〈關於小說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考辨〉，《明清小說研究》1988：4，頁 13。

過程之前，這樣的論斷其實是不穩固的。而〈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的內容是弘光認為刑部對於附逆闖明臣處置太輕，應加以嚴懲。顏美娟先生認為此事與當時的刑部尚書解學龍有關^[70]，但根據談遷《國權》與季六計《明季南略》的記載，弘光於甲申（1644）七月八日癸巳「命刑部定從逆諸臣罪，做六等定罪」^[71]，後因弘光不滿刑部所定出的六等罪責太輕，故於同年八月初八癸亥，諭令刑部云：「賊領兵獻策，明係謀危社稷，即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第二等；四五品科堂及科道翰林侍從之臣，受賊僞命，並守巡等官而降，豈可止於一絞；庶官僞命及封疆大吏巡方司道，聞變倡逃，罪豈止於流戍；獻女獻婢受選者，罪豈止於一徒。其更議之」^[72]，這則諭令的內容此正與周藏本書末所附〈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如出一轍。如此一來，這件事非但不是發生在 12 月，也與解學龍無關，解學龍於同年才 10 月任刑部尚書。^[73] 因此，顏氏的看法不能成立。此外，解學龍於 12 月所上的奏疏並非是定出六等罪責的標準，而是依六等定出叛逆諸臣應有的罪責。換言之，刑部先定出判刑輕重的六種標準，解學龍之後再提出實際附逆諸臣的名單及其罪責。

透過對臺灣國圖本《剿闖小說》版式與內容特徵的說明，以及與周藏本的比較，我們可以得知，臺灣國圖本刻印精美，絕非翻印本所能及；其次，臺灣國圖本其前後內容風格統一，並未有翻刻他本的痕跡；再次，與周藏本相較，臺灣國

[70] 陳大道先生僅提到〈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反應南都黨爭激烈，阮大鍼、馬士英欲借此案排除異己」，並未明確說明此事發生的時間，頁 144。而顏氏則認為〈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發生於甲申（1644）十二月，此時解學龍正任刑部尚書，見頁 246。

[71] 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88.6），卷 102，「思宗崇禎十七年七月癸巳」條，頁 6128；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12），卷 2，第 103「僞官」條，頁 127。

[72] 引文引自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權》，卷 102，「思宗崇禎十七年八月癸亥」條，頁 6136。清·計六奇《明季南略》所載弘光諭旨與《國權》略有不同，其云：「所擬從逆諸臣，如領兵獻策，即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堂科道翰林，受賊僞命，豈可止於一絞；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於流；獻女獻婢，豈止於徒。諸臣負恩辱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見卷 2，第 103「僞官」條，頁 128。

[73] 見柳亞子，《南明史綱》，頁 7。而《明季南略》未載此事，然《國權》先於「思宗崇禎十七年八月癸亥」條，提及「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奏從逆罪案」（頁 6136），卻又在「思宗崇禎十七年十月丁丑」條云：「解學龍為南京刑部尚書」（頁 6158），解氏於十月丁丑任刑部尚書，不可能在八月就經手此事，前者顯然誤置。

圖本因有〈左良玉上弘光帝疏〉，可以證明其為較早刊印的版本，而周藏本則是經過了龔雲起的增刪改易，反而是較晚刊印的版本。不過，臺灣國圖本因為某些因素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視為與日本內閣文庫本同版，而受到忽略，如潘建國先生提到：「現存四種刻本，據其版式行款，可分為八行二十二字、九行二十六字兩個系統。周藏本、興文館本屬於前者，哈佛藏本及吉社藏本屬於後者。」^[74]引文中的「興文館本」指的是日本內閣文庫本，而非臺灣國圖本，這不僅忽略臺灣國圖本在 9 行，行 26 字這個系統的重要性，同時也混淆了兩種興文館刊本的差異。經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臺灣國圖本，是目前現存最早的刊本，在探討《剿闖小說》的版本問題時，其重要性與地位自然不容忽視。

五、與臺灣國圖本同版或相近的版本

《剿闖小說》半葉 9 行 26 字系統除了臺灣國圖本之外，美國哈佛燕京本與中國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刊本，其版式行款均與臺灣國圖本相同。美國哈佛燕京本原為戲劇學家兼藏書家齊如山舊藏，齊氏於 1948 年年底離開中國大陸，隨身帶部分善本小說戲曲書籍抵臺，後來這些書籍入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齊氏曾撰有〈百舍齋所藏通俗小說書錄〉一文，說明其所收藏小說的版本特色與價值。^[75]關於《剿闖小說》版式特徵，齊氏云：^[76]

明無名氏撰，題「西吳懶道口授」。明末寫刻本，有圈點，有旁勒，板心有「忠孝傳」三字；全書情節記李闖事始末，至宏光即位南京而止，共十回，不分卷，……余所見之本則無「新編」、「通俗」四字，正文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六字，前亦有插圖，且頗精緻，惜已殘缺，而書首序文等則全行失去，不知為何處出板。但字頗圓潤，凡明朝皇帝宮庭等等字樣應抬頭者，無不抬頭，則其付刻時，清兵勢力或尚未到江南。

[74] 同註 11，頁 69。

[75] 〈百舍齋所藏通俗小說書錄〉原名〈小說鈎陳〉，最早發表於 1946 年 8 月 14 日北平《新日報》第二版，日後改以〈百舍齋所藏通俗小說書錄〉為名，發表於《圖書季刊》、《中國一周》等刊物，並收錄於《齊如山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12）之中。目前北京中華書局藏有手稿本《小說勾陳》。關於齊如山《小說勾陳》相關版本以及內容之考訂，詳見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4）。

[76] 同註 5，頁 16。

由於此書書名葉以及序文佚去，故無法得知其刊刻書坊，出版訊息不明，僅能知悉此書行款版式特徵。日後，吳曉鈴先生至燕京圖書館披閱齊氏舊藏小說戲曲，他輯錄出齊如山為家藏小說所作之題跋，並附小說回目及案語，發表〈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一文^[77]，然文中並未對《剿闖小說》之版式多所補充。學界對於美國哈佛燕京本的了解均來自齊、吳兩人所著錄的內容，但由於此書出版訊息不明，再加上學界長久以來認為興文館刊本行款僅有半葉 8 行，行 22 字系統。因此，學界一直未發覺美國哈佛燕京本與臺灣國圖本同為半葉 9 行，行 26 字興文館刊本。

筆者有幸得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沈津先生的協助，請沈先生代為影攝該館所藏齊氏舊藏《剿闖小說》書影。^[78]該書書名葉、序文以及目錄全佚，存插圖三葉六幅，其中四幅殘損不全。而第十回亦缺第十葉至第十四葉，書末則附有齊如山跋語（見附圖五）。經由比對，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國圖本與美國哈佛燕京本在插圖形式、作者題署、字體特徵，以及版式行款等特徵上相同（見附圖六、圖七），顯見兩者同版，均為興文館刊本。而美國哈佛燕京本亦無潘建國先生所云，如日本內閣文庫本有翻刻他本之痕跡。

附帶一提，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在著錄《剿闖小說》其中一種版本時，曾云：「明寫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板心題『忠孝傳』。有圈點旁勒，附圖頗精。」^[79]孫氏並未註明此書藏處，然就目前所存三本行款半葉 9 行，行 26 字的《剿闖小說》來看，這個版本並非南京圖書館藏本（後入藏臺灣國圖），亦非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本^[80]，原因在於孫氏已註明南京圖書館藏本，不可能將同藏於南京圖書館的另一部刊本置之不理，由此可知此非南京圖書館藏本；同樣地，孫氏若知悉吉林省社科院圖書館藏有《剿闖小說》，自當註明藏處，不應遺漏。筆者推測孫氏所著錄的版本應是齊如山舊藏本（即後來的美國

[77] 吳曉鈴，〈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明清小說論叢》第 1 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5），頁 289-320。

[78] 沈津先生於 2007 年 7 月 28 日以電郵惠寄相關書影，謹此致謝。

[79]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78。而在 1957 年版的《孫目》則云此版本為「明末寫刻本」，多一「末」字，見氏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頁 68。

[80] 筆者未見原書，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題要》云：「清初刻本，十回，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版心題『忠孝傳』，白口，四周單邊」，見頁 296。

哈佛燕京本)。先從兩人所著錄的內容來看，兩者文字敘述雖略有差異，然著錄的小說版本相同。再由齊、孫兩人的交遊說起，齊如山在八年抗戰期間曾與孫楷第互有書信往來，共同討論齊氏所藏小說版本等問題^[81]，因此孫氏對於齊氏所藏小說的版本狀況頗為了解，這也影響日後《孫目》若干條目的修訂。對此，張守謙先生曾云：「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57年版增補著錄之書，亦有數種係齊氏所藏，緣於某種關係，孫氏未注書之藏所。」^[82]1940年代末期國共內戰，齊氏政治傾向與共產黨不合，所以選擇到臺灣定居，這牽涉到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此孫氏未注明齊氏舊藏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83]

《剿闖小說》半葉9行26字系統尚有吉林社科院圖書館藏本，筆者未見原書，此書是否與臺灣國圖本以及美國哈佛燕京本同為興文館刊本，則有待他日經眼方能確定。但經由上文的討論，我們已釐清臺灣國圖本與美國哈佛燕京本的關係，以及在探討《剿闖小說》相關版本之演變時的重要性與地位。

六、結語

明末清初時事小說常隨著時勢的動盪變化而改易內容，再加上古代著作權觀念不甚明確，書賈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之下，常有翻刻盜印、粗製濫造之事，其手法不勝枚舉，這使得通俗小說的版本更加複雜，本文所討論的《剿闖小說》便是這樣的一部小說。不過，學界在《剿闖小說》相關版本之演變時，常忽略了臺灣國圖本，甚至將其與日本內閣文庫本混淆，遂做出錯誤的判斷。有鑑於學界對於臺灣國圖本的認識不深，筆者試圖先介紹此書的來歷，以及入藏臺灣國圖的過程，從中可見此書流轉多方、經手多人的坎坷命運，以及各地志士搶救國寶、保

[81] 齊氏曾云：「怕自己所見不廣，自己雖然認為難見，而或者竟是平常之書，也未可知，乃開了幾十個書名，寫信給孫子書名楷第，因為他是通俗小說目錄的專家，問他這些書是否難得？並把想寫《小說勾陳》的意思，也告訴他。他給我寫了一封回信說：『這些確都是難得之書，且有許多孤本』，極力慫恿我，把這本書寫成。」齊如山，《百舍齋存戲曲書目·百舍齋所藏小說書錄跋》，收入《齊如山全集》第4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12），頁5（總頁2593）。

[82] 劉葉秋、朱一玄、張守謙、姜東賦主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7），張守謙撰「版本·百舍齋」條，頁124。

[83] 透過相關資料的比對，我們可以發現孫楷第在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57年版）時，參考、徵引齊氏舊藏的小說應有19種，詳見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頁168-177。

存文化所付出的心力。而從眾人的珍視與搶救，也直接說明了這部《剿闖小說》的珍貴性。

臺灣國圖與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兩種興文館刊本，無論是在版式或是在內容上都有明顯的差異。學界之所以混淆這兩個版本，乃肇因於小說書目、善本書目對此書著錄的模糊，使得研究者無法分辨這兩種版本的不同，造成長久以來的誤解。這也提醒著我們，準確而詳盡地著錄每部古籍的版本特徵，對於往後的研究深度的擴展是極為重要的。

在釐清了兩種興文館刊本的差異之後，我們可以從臺灣國圖本與中國國圖藏周越然舊藏刊本兩種版本的比較中得知，臺灣國圖本在版本形式上絕非翻刻本所能及，其前後內容風格頗為統一；而且，臺灣國圖本有其它刊本所無的〈左良玉上弘光帝疏〉，也未經過龔雲起的增刪改易，可以證明其為目前現存最早的刊本。因此，在探討《剿闖小說》的版本問題時，臺灣國圖本（半葉9行26字系統）的重要性與地位自然不容忽視。除此之外，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與臺灣國圖本同版的《剿闖小說》，經過比對，可知其亦為明末興文館所刊刻，這有助於彌補學界長久以來對該書出版訊息不甚明白的狀況。

致 謝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及補充資料，使筆者得以釐清相關問題，讓本文的論點更為周全，謹此致謝。同時感謝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善本書室諸位館員，以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沈津先生所提供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收到日期：96.8.25；修訂接受日期：96.12.23）

參考文獻

-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5）
- 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9）
- 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公司，1990.2）
- 吳曉鈴。〈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明清小說論叢》第1輯（瀋陽：春

- 風文藝出版社，1984.5），頁289-320
- 李漢杰主編。《中國分省市縣大辭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0.12）
- 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刊》，1997：1（1997.6），頁95-115
- 周勛初。〈季振宜唐詩的編纂與流傳〉，載於：周勛初，《周勛初文集·文史新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9），頁507-525
- 周越然。《書書書》（上海：中華日報社，1944.5）
- 周越然。《書與回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9）
-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3）
- 屈萬里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收入屈萬里。《屈萬里先生全集》第16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2）
-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剿闖小說》，《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興文館刊本影印）
- 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88.6）
- 林清芬。〈抗戰前後鄭振鐸的整理國故與刊印古籍工作〉，《國家圖書館刊》，1999：1（1999.6），頁77-110
- 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1998：1（1998.6），頁1-22。
- 姚邦藻主編。《徽州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
-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
-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2）
-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5）
- 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編輯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4）
-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2版（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12）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上冊（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年8月）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6：1（1983.4），頁57-104
- 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12）
-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載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3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12），頁181-220
- 陳大道。〈剿闖小說三種不同版本的問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3：1（1990.6），頁

143-150

- 傅惜華。〈《樵史演義》之發見〉，《逸經》，20（1936.12.20），頁27-29
- 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6）
- 齊如山。〈百舍齋所藏通俗小說書錄〉，《圖書季刊》，8：3、4（1947.12），頁14-24
- 齊如山。《齊如山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12）
- 劉葉秋、朱一玄、張守謙、姜東賦主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7）
- 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5）
- 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12）
- 蔣復璁。〈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4：1（1981.6），頁56-57
- 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2（2003.10），頁125-146
- 盧錦堂。〈國立中央圖書館古籍蒐藏與整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1（1993.4），頁149-165
- 蕭相愷。《珍本禁毀小說大觀—稗海訪書錄》2版（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7）
-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12）
- 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5）
- 懶道人。《李闖小史》（重慶：說文社，1944.3）
- 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4）
- 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11）
-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9）
- 欒星。〈明清之際的三部講史小說——《剿闖通俗小說》《定鼎奇聞》與《樵史通俗演義》〉，《明清小說論叢》第3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6），頁146-163
- 欒星。《甲申史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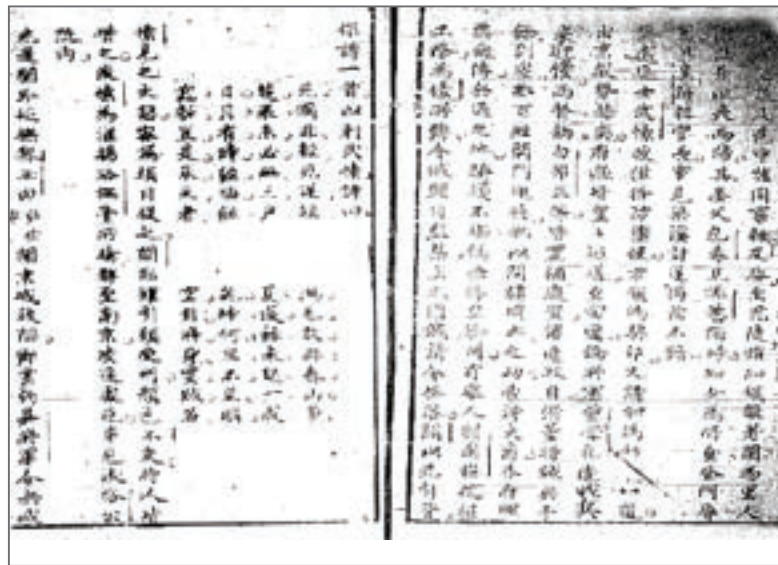
附圖



圖一：上圖取自日本內閣文庫本^[84]，下圖為取自臺灣國圖本。^[85]日本內閣文庫本於第三回末留有「待清居士」贊語，此為翻刻他本之痕跡，而臺灣國圖本無此贊語。

[84] 懶道人口授，《剿闖小說》，《古本小說集成》據日本內閣文庫本影印，頁 100-101。

[85]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剿闖小說》，臺灣國圖本，第三回，第 11 葉 B 面—第 12 葉 A 面。



圖二：上圖取自日本內閣文庫本^[86]，下圖取自臺灣國圖本。^[87]日本內閣文庫本於第十回有「待清居士」贊語，此為翻刻他本之痕跡，而臺灣國圖本無此評語。

[86] 同註 84，頁 341-342。

[87] 同註 85，第十回，第 3 葉 B 面—第 4 葉 A 面。



圖三：左圖取自日本內閣文庫本^[88]，右圖取自臺灣國圖本。^[89]日本內閣文庫本於第六回有行間夾批，此為翻刻他本之痕跡，而臺灣國圖本則無。



(1)

(2)

[88] 同註 84，頁 202。

[89] 同註 85，第六回，第 10 葉 B 面。



圖四：(1)(2)二圖取自日本內閣文庫本^[90]，(3)(4)二圖取自臺灣國圖本^[91]，二組圖片內容同為「李公子民變聚眾」、「宋矮子私譚朝政」。臺灣國圖本插圖較日本內閣文庫本精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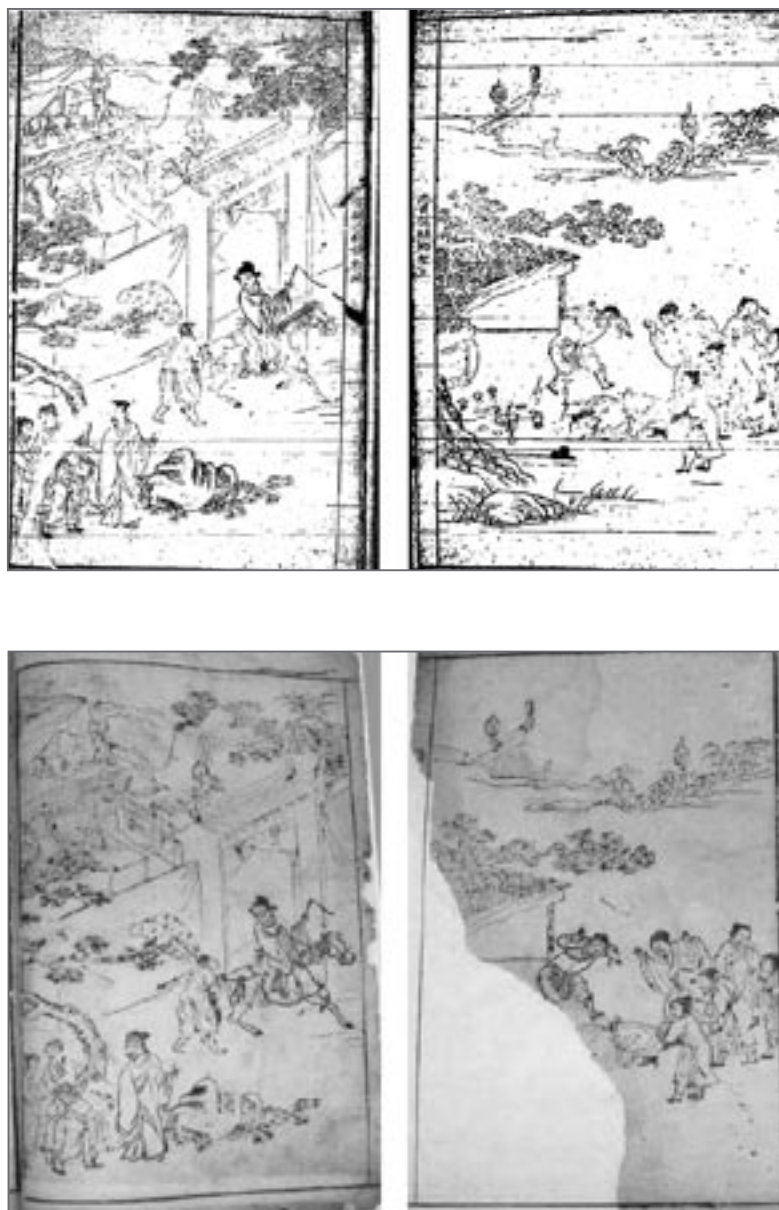


圖五：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齊如山舊藏《剿闖小說》第十回及書末齊如山跋語書影^[92]，第十回僅止於第九葉，第十葉至第十四葉失去。

[90] 同註 84，頁 1、4。

[91] 同註 85，插圖。

[92]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剿闖小說》，美國哈佛燕京本，第十回，第 9 葉 B 面，及書末齊氏跋語。



圖六：上二圖取自臺灣國圖本^[93]，下二圖取自美國哈佛燕京本。^[94]

[93]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剿闖小說》，臺灣國圖本，插圖。

[94]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剿闖小說》，美國哈佛燕京本，插圖。



圖七：上二圖取自臺灣國圖本^[95]，下二圖取自美國哈佛燕京本。^[96]

[95] 同註 93。

[96] 同註 94。

A Study of *Jiachuangxiaoshuo* Collected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Jiachuangxiaoshuo* at Present

Ching-wen Luo

Abstract

Academia often confuses the editions of *Jiachuangxiaoshuo* because schola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Jiachuangxiaoshuo* of Xingwenguan printed copy collec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NC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ource and the collecting process of *Jiachuangxiaoshuo* 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then explain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se two editions of *Jiachuangxiaoshu*. At the same time,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reason of academia confus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Jiachuangxiaoshuo* collect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the original edition at present through comparing two editions of *Jiachuangxiaoshu*. Accordingly, we can't ignore the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Jiachuangxiaoshuo* that is collect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s thesis finally introduces the edition of *Jiachuangxiaoshu* that is collected at Yenching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like to another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Keywords (關鍵詞)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 *Jiachuangxiaoshuo* ; Xingwenguan Printed Copy ; Edition
國家圖書館 ; 剿闖小說 ; 興文館刊本 ; 版本

Ching-wen Luo : Ph.D. student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E-mail : jiingwen123@pchome.com.tw